绪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谈到外交学的建设问题。他明确指出：“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 10 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还没有开始。”“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①]周恩来向中国外交战线的科研工作者明确地提出了创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的重要任务。

建国已经近 50 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外交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越来越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及时的重大调整，使之更为完善，从而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国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中国在近 50 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的独特外交风格和发展的外交理论观点，为实现周恩来建立中国外交学的遗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十分有利的条件。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建立“中国化的外交学”，应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大课题。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学习外交战线老外交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外交实践经验，并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交学和外交业务与技术的科研成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逐步建设好外交学这门新的重要学科。

一、外交的概念和特性

什么是外交？“外交”一词在中国古代已经出现，如《墨子》中说“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国语》中说：“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这里乃是指“人臣私见诸候”，或指与朋友、与外人的交际，并非今日“外交”的含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外交，但古代中国称外交为“外事”，清末曾称“外务”。“外交”一词具有今天的含义，即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交往与交涉，是中世纪后期，特别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的结果。欧美语言中的“外交”，如英语的 diplomacy，法语的“diplomatie”，俄语的“дипломатия”，等等，大多源自希腊语，罗马字母拼写为“diploma”。希腊语的原词义是指古希腊君主或元老院派遣使节时所颁发的证明其身份的“双重折叠”的特许证书，或这种证书的“副本”。从这个词里后来演变出“外交”一词。

外交的定义，国外学者论述颇多，但观点歧异，众说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atow）在其所著的《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②

《牛津英文字典》认为：“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③

美国《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是：“驾驭国际谈判的艺术。”④英国《朗曼现代英语词典》的解释是：“有关国际关系的科学”。⑤原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主编的《外交辞典》（新版）认为：“外交是各国首脑、政府和专门涉外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活动，旨在

通过谈判、文书往来和其他手段来实现由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对外政策方面的目标和任务，以及捍卫该国在国外的权利和利益。”⑥维辛斯基等主编的《外交辞典》(原版)中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对外政策实质上不仅决定外交的内容，而且也决定外交的性质和方法。”⑦

我们中国学者对外交的定义，有代表性的见于《辞海》，它对外交的解释是：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各国对外交这一概念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含义和特点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交与主权的关系。外交是独立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行为，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主权国家既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外交的主体。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外交权，外交权是主权的一个属性。

第二，外交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从前面提到的对外交所下的各种定义看，外交都被认为是一国实施其对外政策的手段。这些定义都不涉及一国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因而这样的定义旨在普遍适用于所有主权国家。但任何国家都有由其最高决策机关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为维护本国利益，争取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而制定的或调整的外交政策。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甚至截然不同，所以外交对于所有国家虽同为实施本国外交政策的手段，但不同的外交政策却决定了不同国家所从事的外交的性质、内容、风格和方法。这就形成了形态和类别迥异的外交。这说明外交同外交政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外交是实施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不是惟一手段），没有外交这一手段，外交政策难以实施，而没有外交政策，外交也不成其为一种手段。所以一般我们使用外交一词时既包括一般意义

上的外交，也包括具体形态和类别的外交。但凡具体谈及外交时，都在外交前加一限定词，以表明其不同形态和类别，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强权外交、经济外交、多边外交、全方位外交，等等。外交学不仅应为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或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下一普遍适用的科学定义，也应探讨形态和类别日益扩大的各种外交。

第三，外交主要是官方的对外活动。国家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的战略目的和任务而开展的对外活动，主要由正式代表国家的官员和机构来进行，即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经正式授权的外交代表以及以国家、政府、外交部及常驻外交代表机关名义进行的正式的官方活动。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因此，尽管国家间的交往可以有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多种形式，但外交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通过官方的正式活动。

第四，外交的活动方式与手段。国家间或国际组织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边或多边问题采用的是和平手段，一般包括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但如前所说，外交是推行一国对外政策和解决对外问题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惟一的手段。一国推行对外政策常需同时或交替使用各种综合手段。譬如，外交与军事就紧密相联，常常互相配合。这是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

第五，外交是一种科学和艺术。外交本身是和平处理国家关系的科学和艺术。国际上一般认为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谈判是外交的最重要的活动方式，因而外交谈判也最能体现外交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各级外交官均应认识和掌握外交这门科学和艺术，具有从事外交事务的优秀品德和业务素质、以及具有善于谈判和社交的能力。

第六，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同，各国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和利益不同，因

而其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也各异。从实质上说，外交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外交行为的内容和性质，一般都是由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利益所决定的，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方面的问题，从本书有关章节所论述的外交的起源与历史演变中可以了解其概貌。

第七，外交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国外交的基础和后盾。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外交也是。谈不谈判，谈判达成什么结果，谈判各方各做出多少让步，都取决于当时各方的综合国力。

第八，外交有正义与与非正义之分。从各国奉行的不同对外政策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外交同战争一样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采用的手段也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当今外交已存在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为国际所公认的客观标准，这就是以主权平等为主导的联合国原则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书也有专门的章节论述。

第九，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外交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外交决策权都在一国最高决策机关。各级外交代表和机构在具体执行中虽有一定的机动权，但凡涉及决策问题均无权自行其是，因而授权有限。一般说来，“外交无小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外交的定义可简要地概述如下：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对外政策形成不同形态和类别的外交。如简而言之，广而言之，外交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

周恩来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他接着明确回答说：“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8]这说明，外交工作只能通过建立和发展国家间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常关系，既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利益，又尊重别国的主权和正当权益，并维护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争取人民，广交朋友，打开和扩展外交局面。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正常关系，并且倡议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外交活动在国际关系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由于当今的世界局势复杂多变，国际间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特别是有的大国和国家集团，从其意识形态和大国利益出发，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继续推行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动辄对别的国家施加压力、进行制裁，甚至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明目张胆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从而使国际局势经常动荡不安。因此，做外交工作或处理对外关系，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两点论”：既要讲经济，又要讲政治；既要讲友好，又要讲斗争；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9]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也为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外交工作明确了指导原则。

二、外交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指导思想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科学对象和研究领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0]

外交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这一领域所特有的矛盾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经验，并探索外交行为的规律性的学科。作为中国的外交学，尤应着重研究和总结本国的外交思想、风格和外交实践经验。

但是，外交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如同外交的定义一样，各国学者的见解也不尽相同。有的强调研究外交的实务和技术，有的强调研究外交的学理和规律，也有的主张研究外交的学理和技术并重，两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顾少川曾说：“外交固不能脱离事实，尤不能脱离学理。前者为外交术，后者为外交学。无外交学则不能有外交术。学理与技术，盖外交前进之双轮也。”[11] 还有人认为：“有术无学则失之黠，有学无术则失之虚。”[12]

我们认为，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立中国化外交学的倡议中已经明确说明：应把我们的对外斗争经验，“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同时又指出：“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做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13] 在这里，既强调了研究外交学应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也阐明了研究外交学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理与实务并举的原则。也就是应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加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探讨其学理和规律，并懂得外交业务和技术，以指导新的外交实践。这是十分清楚的。应当指出，外交学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因而各国学者对外交学的探讨有着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并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见解。

关于外交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以来，随着大国间外交关系的发展，有的法学家和其他的学者开始研究外交活动的实际经验、寻求解决国际争端与外交纠纷的方法，以及探索外交的原则、规范、惯例和技术等问题，从而使外交法、国际法、外交学得到了逐步发展。如国际法科学的鼻祖 H·格劳秀斯（Grotius，H）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 年），有专章叙述使节的权利；A·威克法尔（Wicguefort，A）的《使节及其职权》（1676年），曾长期是西方外交官的必备指南。[14]随后有 O·克劳斯克（Krausko，O）的《现代外交学

的发展》、L·奥本海（Oppenheim，L）的《国际法》、R·项纳（Genct，R）的《外交学与外交法》、马尔丹斯(Martens)的《外交学》、E·萨道义(Satow，E)的《外交实践指南》、H·尼科松（Harold Nicolson）的《外交学》、维辛斯基和葛罗米柯等先后主编的《外交辞典》,以及B·森（B. Sen）的《外交人员国际法与实践指南》等书问世。另外，还有一些世界外交史和国别外交史出版。

在中国，关于外交学译著最早的是《外交精义》（从日文翻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著作有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廖德珍的《外交学》、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杨熙时的《现代外交学》。解放后翻译出版的有哈罗德·尼科松的《外交学》、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维辛斯基等主编的《外交辞典》、R·G·费尔萨姆（Feltham，R. G）的《外交手册》、埃里克·克拉克（Eric Clark）的《外交官生涯》、马丁·梅耶(Martin Mayer)的《外交官》、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的《首脑外交》等。[17]最近几年，中国学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已编写和出版了多部外交学方面的著作和几种有关外交技术的知识性读物。

外交学的研究范围与领域，各国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也反映了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外交学主要研究外交为实施国家对外政策所涉及的各种专门知识和技术，同时也涉及外交理论、原则、制度、规范、历史、策略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如以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松的《外交学》[18]为例，全书10章涉及：正规化外交的起源、外交理论的发展、从旧式外交向新式外交转变、民主的外交、理想的外交家、欧洲外交的几种类型、最近外交实践的变迁、外交程序要点、外交官制、外交用语等。我们撰写本书尽力从全面的视角来建立学科体系，并注意突出重点，有侧重地进行系统论述。既有专章论述外交的起源与历史演变、现代外交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又有专章阐明当代外交的基本准则、规则与惯例、当

代外交的方式、外交机构、外交代表、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交涉与谈判、国际会议、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以及外交业务与技术；还重点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外交风格与特色，以及外交官的素质要求、遴选与培训问题。考虑到有些课题涉及国际法的学科对象与研究领域，在各章中力求概括介绍与分析。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高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前有关现代外交的论著，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其阐述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而本书则着重介绍和阐明外交学的基本学理，以及最重要的外交业务与技术。

我们编著这部《外交学概论》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外交学理与外交实务并重。周恩来倡导的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把外交经验加以整理，使之科学化和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这是我们撰写外交学和今后进一步研究外交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向。

其次，我们尽可能地突出外交学的科学对象，明确外交学的研究领域，避免与交叉学科的过多重复。本书在涉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学、国际法学、外交史学、世界经济学等学科的内容时，力求突出外交学本学科的重点，需详则详，需简则简。

第三，注意以现代外交、特别是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为研究的重点，尤其着重研究和体现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卓越代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毛泽东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邓小平文选》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珍贵文献。他们对战后国际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科学论述，他们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独具特色的外交艺术和风格，为中国外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我们还注意系统地介绍国际公认的当代外交基本准则、当代外交所遵循的规则、制度和惯例，以及一般的外交业务与技

术等，以便于了解和熟悉外交学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及其发展概况。

三、外交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

在当代，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各国学术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以科学回答。因此，当代学科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并驾齐驱。据不完全统计，学科总量已达3000门之多；同时，也出现了边缘性、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不仅原有的学科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展，而且新兴学科又不断兴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也在发展中。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在社会领域的应用日益普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已广泛地为社会科学所借鉴。在这种趋势下，跨学科、学科群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

外交被看作是“外交家的业务或艺术”，或是“谈判的科学或艺术”。[17]外交学既然是对外交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和规律性的探索，因而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不能不与有关学科有所交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只有认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才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和普遍根据；但是，如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故此，处理好外交学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突出本学科新具有的特殊研究对象和领域，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般说来，除外交史、外交政策比较研究学科与外交学的研究领域密不可分外，同外交学有着交叉关系的学科，主要是国际政治学、世界经济学（西方有国际经济学）、国际法学等。

国际政治学　　主要是研究和认识国际社会中国家与集团的行为表现、结构体系、基本特点、政治思潮，并探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当代国际政治已发展为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结构体系，国际政治参与者日益增多，各种矛盾与竞争日益

深化，新科技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因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研究外交学，不能脱离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即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首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整体上，探索国际关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特别在当代，应对国际多元政治中的国际关系及其种种表现，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认识，这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外交实践是十分重要的。如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科学理论观点，就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至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也是对国际政治行为进行理论探索，在不同的时期曾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其他学派和思潮，我们应持科学态度进行评价，有鉴别地为我所用。

其次是国际关系史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与国（包括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而着重的是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这门学科也是世界史的分支学科。熟悉和掌握国际关系史的专业知识，对研究外交学是必不可少的。如外交的起源、传统外交到现代外交的演变、外交基本准则与惯例的形成、国际会议与国际条约的背景、国际法的来源与发展、现代国际法的动向等，无不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是国际关系现状研究。它主要是探讨和分析当前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战略格局、重大国际问题的形成与症结、国际形势发展的态势与特点、各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并预测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在高科技飞速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形势下，只有加强对当前国际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开拓性研究，才能开阔视野，增强适应能力。外交学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总结新的外交实践经验，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开创现代外交新局面服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经济学　它主要是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以及国际生产关系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整体性和综合性的重大问题，并不断研究世界经济的新现象，解决新问题，从而揭示世界经济的运动形式和发展规律。在当代，各国的外交越来越重视经济外交，要求外交官熟悉世界经济的专业知识，掌握经济调研的基本技能，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交流服务。因而，对世界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技术援助、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的经济战略、东西及南北经济关系、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世界人口、资源、环保，等等，都应有概括的了解和基本的知识。这些问题虽不是外交学的研究对象，但对拓宽外交学的研究领域都有重大影响。经济外交已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到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国际外交舞台必将进一步显示出经济外交，甚至科技外交的特殊意义。

国际法学　　国际法中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学有着广泛的交叉关系。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它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是在国际关系中产生，又随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国际法是基于各国协议而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是由超国家的强制机构来实施；因而国际法是法律的一个特殊体系。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 年）标志近代国际法诞生后，该学科不断有所发展。但传统国际法的内容主要是和平法、战争法、中立法等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形成现代国际法。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独立国家的崛起，联合国的创建和《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其他全球性和地域性国际组织的增多，世界经济关系与经济秩序的变动，以及新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国际法的内容日益丰富，范围更为广泛，产生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外交关系法、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法、条约法，等

等。[18]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相当部分都与外交学的研究内容有关。当今世界由近 200 个制度和类型不同的主权国家组成，绝大部分又为联合国成员，这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成为国际公认的指导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国际法。故外交学被认为是“实用的国际法”。国际法是一门重要的外交专业课程，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领域不是外交学所能替代的，因此，妥善处理两者的交叉关系，突出外交学的特色，既重外交学理，又重外交实践，建立中国化的外交学的新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外交学虽与其他学科互相交叉，相互渗透，但它又是一门独立的、具有特定研究领域的学科。因此，只要能充分吸收和应用有关学科的新的科研成果，参考各国外交学的专著并注意研究其现状、动态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外交实践的丰富经验，有计划地开展课题研讨，使之系统化、科学化，必能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外交学的科学体系，把这门学科建设好。

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外交学的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情况下，建设外交学，普及外交学，不仅是专门从事外交的实际工作者的业务需要，也是一切从事外经、外贸、文化交流、科技合作、国际交往等涉外工作者的普遍需要。

首先，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外交学的学理和业务知识，有利于提高外交人员从事外交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开拓精神，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中国外交展开了新篇章。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掌舵和决策之下，制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广泛发展对外关系，经过近 50 年的实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国际上为和平与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和影响。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它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它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范例；它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为反殖、反帝和反霸，为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日益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它在国际交往和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和艺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因此，中国外交工作者既要熟悉国际社会中各国外交，从传统外交到现代外交的准则、制度、惯例、方式和技术；更应着重学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外交战略家的外交思想、实践和风格。建国以来，中国外交人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随着新的高科技的发展，国际形势的巨变，以及国内全面改革的深化，中国外交人员无一不面临着外交实践中需要研究的新情况，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各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新调整，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裁军的新动向，多边外交与经济外交在现代外交实践中的作用和规律，以及外交与文化、外交与科技、外交与哲学、外交与信息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等。只有不断地研究新课题，总结新经验，才能尽量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贯彻执行外交政策的自觉性、预见性、创造性。

其次，建设和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外交学，是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外交人员，使其熟悉和掌握外交理论和业务知识，打好业务基础之必需。

为适应中国四化建设和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邓小平曾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强调：“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

应能力。”因此，在一般高等院校开设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这门新课。作为未来的新一代外交人员，不仅要学习掌握世界政治、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以及锻炼和提高观察、分析当代国际形势及国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要系统学习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外国政治制度、中国对外关系、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专业课程，扩大知识领域，提高业务水平。外交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新一代的外交人员都有必要学习外交学，熟悉一般的外交学理、外交历史、外交制度、外交方式、外交业务与技术、外交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应熟知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这样，既可以明确地了解外交工作对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将来担负外交职责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又可以概括地认识作为新一代的外交人员所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才能，培养优秀的思想品德，学好理论、语言和各种专业知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当前形势对外交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外交人员如不根据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刻苦学习打好基本功，是难以胜任工作的。

第三，建设外交学，普及外交知识，对一切从事外经、外贸、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友好往来等涉外工作者，以及对于开展民间外交（人民外交）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根据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与四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从而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到1996年10月为止，中国已同约16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济贸易往来，而科技、文化、体育等友好交往更为普遍和频繁。中国还积极而广泛地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在各个领域的国际间合作，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曾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把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摆到对外工作的更加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外交工作范围更宽了，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要求他们能配合经济、科技各部门做好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外事工作，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而从事各类涉外工作的人员除学习掌握本领域本行业的业务与技能外，也都要娴习外交学，熟悉对外政策，懂得国际法知识，学习外交常识，否则，也将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和做好各类涉外工作。

中国的外交学尚属初创，要按照周恩来生前的倡议，将外交实践经验加以系统化和科学化，使之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具有科学体系的当代外交学，还有一个坚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过程，这需要外交实际工作者和外交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协同攻关。

注释：

①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 页。

② ［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 页。

③转引自［英］哈罗德·尼科松：《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3--24 页。

④［美］《韦伯斯特英语词典》，大百科全书 1979 年版，上卷第 515 页。

⑤［英］《朗曼现代英语词典》，1976 年版，第 296 页。

⑥ ［苏］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辞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327—329 页。

⑦［苏]维辛斯基等主编:《外交辞典》,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1页。

⑧ 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2 页。

⑨ 《人民日报》 1989 年 7 月 13 日。

⑩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284 页。

⑪⑫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中华书店 1937 年 7月版，第 4—6 页。

⑬ 同①。

⑭ ［苏］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 1 卷 （上），第 305—307 页。

⑮ 参考本书各章的注释。

⑯ 同③。

⑰ 同②。

⑱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